鸿门宴的主人公

为什么是樊哙？

·黄西蒙·

司马迁为什么能写出精彩细节？

《史记》中的鸿门宴故事，堪称国人熟知的千古名篇，其中的人物对话和现场细节，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。司马迁显然没亲历过楚汉争雄的时期，鸿门宴的故事，对他来说即便不算古代史，也算得上是近代史，那司马迁为什么能写出如此生动的细节呢？这样“脑补”出来的记载，足够靠谱吗？

司马迁对于历史的态度极其严谨，后世不清楚的细节，不意味着司马迁没看到相关史料。更重要的是，司马迁还做了一件许多书斋史学家没有做的事情——采访，也就是记录口述历史。司马迁会亲自到历史故事的发生地，采访当地的百姓，从民间寻找历史的踪迹。史学家李开元在《论〈史记〉叙事中的口述传承——司马迁与樊他广和杨敞》一文中，就提到司马迁是通过樊哙（见图）后代樊他广的讲述，了解到了鸿门宴的故事细节，并将其写入《史记》。也正是因此，在这次流传千古的宴席上，本应是配角的樊哙表现极为亮眼，他说的话，竟然比宴席的主角刘邦、项羽还要多！

绝大多数史书的视角，都是全景式的，但在《史记》中，在一些浓墨重彩的篇章里，确实能看到类似个人视角的细节，鸿门宴便是典型代表。樊他广向司马迁讲述家族昔日的辉煌，诉说樊哙在鸿门宴上的功绩，虽然有可能添油加醋，但仍然为后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细节。

樊哙是鸿门宴的真主角

众所周知，鸿门宴是刘邦命运的转折点，而细读文本不难发现，这更是樊哙在历史长河中最重要的一次亮相。

宴席刚开始时，樊哙没有入席的资格，只能在军门外等候。樊哙登场，是因为酒宴上出现了“项庄舞剑意在沛公”的情况，在危急关头，张良偷偷溜了出来，请樊哙赶紧出手保护刘邦的生命安全。樊哙是刘邦的同乡旧部，早年是屠狗之人，但在刘邦军中立下了诸多奇功，很多次攻城都能捷足先登，在勇武和忠诚上，都被刘邦高度信任。因此，把帮助刘邦解除困境的关键任务，交给樊哙来做，也算合情合理。

接下来便是鸿门宴的转折点：樊哙闯进来，要保护主公刘邦。按照一般逻辑，武将救主公，应该是凭借武力，而这个故事中，樊哙却是以智谋挽救刘邦于水火之中，甚至有点抢了张良的风头。彪形大汉樊哙刚一进来，还未说话，就吸引了项羽的注意，说道：“壮士，赐之卮酒。”樊哙十分豪爽，也不推辞，接过酒杯，便一饮而尽。接下来，项羽赐给他的猪腿肉，他也用剑切开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司马迁对这一细节的描述，到了“动作分解”的地步，“樊哙覆其盾于地，加彘肩上，拔剑切而啖之”。接下来，樊哙说出一段经典的豪言壮语：

臣死且不避，卮酒安足辞！夫秦王有虎狼之心，杀人如不能举，刑人如恐不胜，天下皆叛之。怀王与诸将约曰“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”。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，毫毛不敢有所近，封闭宫室，还军霸上，以待大王来。故遣将守关者，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。劳苦而功高如此，未有封侯之赏，而听细说，欲诛有功之人。此亡秦之续耳，窃为大王不取也。

在后世不少人的记忆里，樊哙只不过是个有勇无谋的武将，但樊哙在此时说的一番话，简直有春秋战国时纵横家之风，不仅有理有据，还能结合暴秦的典故，让其言论有了当时最具道义合法性的根据——反对残暴不义，仁德者才能拥有天下。再加上之前樊哙饮酒吃肉的夸张动作，把项羽立刻镇住了，这就为刘邦逃离现场争取了可能性。

项羽反应迟缓，没能抓住时机，让刘邦借口上厕所的时候逃走了。这是刘邦在成功前最凶险的经历之一，而帮助他化险为夷的人，不仅是出谋划策的张良，更是直面危急时刻的樊哙。至此，樊哙的“精彩表演”还没结束。刘邦问樊哙该怎么办，樊哙回答：

大行不顾细谨，大礼不辞小让。如今人方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何辞为。

刘邦竟然在慌乱中问樊哙怎么办，而不是问张良，或者自己直接下命令，这似乎不合常态。但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个鸿门宴的细节，很可能出自樊哙后人的讲述，那么这不寻常之处，也就能说通了。

樊哙回答刘邦一番“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”的话，其实也贴合其身份。一般来说，人们在比喻的时候，都会选取自己熟悉的事物。樊哙早年就是屠狗之辈，对屠宰的话题自然再熟悉不过。情急之下，把自己的命运联想到等待屠宰的动物，也是人之常情。当然，这里为何用的是“鱼肉”而非其他牲畜，后世就不得而知了。事实上，对于历史现场对话的还原，即便当事人也未必能做到完全一致，也就更难被后人一字不落地记住。

《史记·樊郦滕灌列传》中为樊哙立传，亦有对鸿门宴故事的叙述，其内容与《项羽本纪》差不多，这也从侧面说明，鸿门宴故事最精彩的场面，恐怕就真的来自樊哙的视角。从史书叙事的层面看，樊哙才是鸿门宴故事的“主人公”。

刘邦连襟，受吕后牵连家道中落

樊哙的历史地位虽然比不上汉初三杰，但也是刘邦帝王霸业中不可忽略的力量。汉朝开国后，樊哙被封为舞阳侯，后来升为左丞相。樊哙还娶了刘邦夫人吕雉的妹妹吕须（也有记载为吕媭）为妻，算是外戚，这让他跟吕家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，也因此在政治势力变化时，后代受到了牵连。

《史记》对樊哙身后的家族历史，记载不多，但从只言片语中，也能让人看到，樊哙的家族从第二代其实就已经开始没落了。实际上，当他们与吕雉家族建立了剪不断的关系时，就已经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了。

刘邦死后，继承人汉惠帝性格懦弱，大权旁落，吕雉及其家族势力长期把控权力，引发刘家及其效忠者的不满。太尉周勃、右丞相陈平等人密谋，平息诸吕之乱。与吕雉有血缘关系者，在变乱中都难逃一死。樊哙与吕须生下的樊伉，一度享受荣华富贵，但在诸吕之乱中被牵连和诛杀。

幸好樊哙还有个庶出的儿子叫樊市人，没受牵连，将樊哙的血脉存续下来。樊市人才活了29岁，他的儿子便是樊他广。不料，后来樊他广因为得罪了一个门客，此人竟向汉景帝告状，说樊市人没有生育能力，樊他广并非其所生。我们并不知道这是否是真的，但汉景帝还是以此为理由，将樊他广贬为庶人，樊哙家族也就彻底没落了。

所幸，家道中落的樊他广有机会向司马迁讲述，通过史家之笔，为后人带来了第一视角的鸿门宴故事，也将樊哙在鸿门宴上的英姿定格成永恒的历史影像。而对于史料匮乏的上古历史来说，类似樊哙式的视角，几乎就成了孤证，后世只能在他的记忆和讲述中，尽可能地寻求历史的真相。

（摘自4月8日《北京晚报》）

程颢：视民如伤的理学家

·吴建设·

程颢（见图），字伯淳，号明道，宋仁宗明道元年（1032年）生于湖北黄陂。祖父程遘曾任湖北黄陂县令，除暴安良，人称程青天。父亲程珦在黄陂任县尉。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，程珦安家于洛阳履道坊。程颢与其弟程颐不仅在伊洛之滨创立了影响深远的洛学，而且由于他从政期间保民爱民的情怀，被称为视民如伤的理学家。

程颢在十余年的从政生涯中，曾任陕西户县主簿，南京上元县代县事，山西晋城、河南扶沟县令。程颢每到一地，就在坐处书“视民如伤”，并说“颢常愧此四字”。视民如伤，源于《春秋左氏传》：“臣闻国之兴也，视民如伤，是其福也；其亡也，视民如土芥，是其祸也。”意思是，尊重、爱护百姓，恐怕惊扰、打动他们，则国家就会兴旺；视百姓如泥土、小草，恣意践踏，则国必亡。视民如伤，成为程颢从政的座右铭，从中折射出他强烈的民本思想。

视民如伤传佳话

嘉祐三年（1058年），考中进士的程颢，到陕西户县担任主簿。程颢在户县十分注重维修河堤，因此当洪水来临时，当地庄稼没有受到损失。而邻县县令却不把修河堤当回事，结果洪水到来时庄稼尽毁。当程颢接到支援邻县抢修河堤的任务后，很快就组织民工，赶往邻县救灾。当地人说：程颢指挥民工就像号令军队一样，行动迅速。由于程颢在主簿任上表现优异，被誉为关中俊杰。

三年后，程颢到江宁府上元县任主簿。程颢上任后，经过调查了解到这里田税不均，比其他地方严重。原因在于该县临近江宁府，肥沃的田地都被富户以高价买了，乡民贪图一时之利，把田地都卖了。程颢看到乡民卖地的严重后果后，协助县令制定了不准买卖土地的规定，民受其惠。

江宁地处长江南岸，是水运要道。从长江上游给京城运粮的船夫生病的，便留在此处治病，每年不下几百人。程颢了解到这些船夫的粮食供应要向江宁府报告，府上给粮券才能发粮。等到拿到漕司的批文，这些船夫都饿了几天了，有的因此而饿死。程颢向漕司报告说：要改变报批的办法，应事先将稻米储存在这些船夫居住的地方，船夫一来就给粮食。

治平元年（1064年），程颢任泽州晋城县令。他一上任，就在县衙大堂上写了“视民如伤”四个字，时时提醒自己爱民保民。按照朝廷规定，晋城的赋税要运到边界缴纳。老百姓肩挑粮食，长途跋涉十分辛苦。程颢了解到这一情况后，便让富户每年到边界去收购粮食，先储存起来。到缴税的时候，便就近缴纳，这使晋城的百姓免去了长途跋涉之苦。

大公之心昭日月

程颢以“教化为先”，致力于发展教育，使晋城乡乡建起了学校。每当政务闲暇时，程颢常常到乡间学校“亲为句读”。他挑选学生中的优秀者重点培养。十几年后，晋城县穿儒生衣服者已达几百人，考中秀才者十余人，一改当地“朴陋”的风俗，出现了“耕夫贩妇，亦知愧谣诼、道文理，带经而锄者四野相望，济济洋洋有齐鲁之风焉”的景象。由于程颢教化有方，晋城这个几万户的大县“三年之间，无强盗及斗死者”。程颢“在邑三年，百姓爱之如父母，去之日，哭声振野”。

程颢在宋神宗时期，曾被朝廷任为监察御史，参与王安石变法，后因与王安石意见相左，出任澶州（今濮阳）判官。熙宁五年（1072年），程颢回到洛阳，与其弟程颐于家中讲学，创立了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理学。程颢说：“吾学虽有所授，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。”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史上，孔孟创立了以“仁”为核心的儒学，二程在继承孔孟“仁”的基础上，提出“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”“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”的命题，将作为伦理道德范畴的仁，升华为哲学本体论的高度，创立了以“天理论”为哲学基础，以正人心、修道德、明义理为核心的理学，为普通百姓确立了道德信仰和道义自觉，影响中国社会近千年。

程颢在陕西户县时，在与表叔张载的通信中，就提出廓然大公的思想。在从政实践中，深知执政者的公心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，他说：“圣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”“一心可以兴邦，一心可以丧邦，只在公私之间尔”“至公无私，大同无我。虽渺然一身，在天地之间，而以天地无异也。”由此可见，程颢的大公之心，昭如日月。

（摘自6月23日《团结报》）